

嵇发根 著

茗边考辨集



黄山书社

茗边考辨集

嵇发根 著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州历史文化/余方德、嵇发根主编. —合肥:黄山书社, 2001

ISBN 7-80630-677-3

I. 湖… II. ①余… ②嵇… III. 湖州市 - 概况 IV. K9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4141 号

*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

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德清新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3.6 字数:1089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01000 册

ISBN 7-80630-677-3 / ·124

定价:99.00 元

自序

东西两苕，自天目而来，或缓或急，或清或浊，于州之西、南入城。余生于苕之西流龙溪分支新塘港东岸，村名井安；长于苕之南流霅溪西岸，埠曰务前河头，里称北街新庄弄；泮于霅水南来之端东岸，校为湖中。一生投怀于斯，虽奔命异乡二十余载，重归故里又十期年矣。区区一体，乃真正苕霅之子也。

湖州，初为菰城，继称乌程；吴兴起于三国，州名源于隋中。绾两苕清流，涵太湖万象。自东晋为善地，六朝成望郡，人文荟萃，风流会聚。青史为之刻墨，方志为之记述，实吾郡取之不尽的宝库。

余沉埋方志十载，领略其浩瀚与精深。助成一代新志《湖州市志》及多种志乘外，亦面世一些考证、论辨文字，所及凡吾郡方土山川名胜与贤才秀异闻达。

凡为文者，欲争名传世者有。余不忍。是为拙作既无好大歌功之宏，又非引经据典之论。心血所凝，实作些寻踪觅迹，改谬勘误、引线穿珠、集成零碎之琐事。可谓替古人论说，供今人参考。故冠名曰《苕边考辨集》。

集中所收，“湖州蚕桑丝绸”、“湖州人物”、“颜真卿与湖州”、“杂考”四辑，另“附辑”两篇。

集自为之，序亦自为之，实平庸而不敢求于高人也。

嵇发根

公元二千年深秋于红丰寓所

目 录

自序.....	(1)
〔湖州蚕桑丝绸〕	
关于蚕桑丝绸起源的探源.....	(1)
关于“湖桑”的辩证	(14)
湖州蚕事俗称考略	(19)
湖州蚕丝源流考	(30)
湖州古代官办丝织机构始末	(49)
〔湖州人物〕	
湖州历史人物纵横观	(54)
一、湖州历史人物纵览.....	(54)
二、湖州历史人物群体.....	(60)
三、湖州历史人物分类观.....	(67)
六朝时吴兴沈氏文人的崛起与发展	(84)
于艳丽中窥清新——	
陈叔宝的宫廷游宴诗和边塞诗刍议.....	(114)
〔颜真卿与湖州〕	
颜真卿刺湖州五年事迹初探.....	(118)
一、颜真卿刺湖州五年小志	(118)
二、携肃宗帝批答御札刺州追建放生池碑	(120)

三、颜真卿在州境胜地杼山再留胜迹	(123)
四、筑韵海楼和撰定《韵海镜源》	(128)
五、开联句风气,举“吴中诗派”旗帜	(133)
六、碑记书帖存千古事迹光万世笔墨	(137)
七、后人对颜鲁公真卿的纪念	(143)
安吉颜真卿墓与颜氏后裔考	(150)

烟波苕霅舴艋情——

颜真卿与张志和在湖州的一段往事	(157)
-----------------------	-------

〔杂考〕

湖州古池考三题	(161)
唐相国池	(161)
唐敕放生池	(163)
明清乌程县学官泮池	(164)
康王未必不过境——宋高宗南渡不过湖境辨	(167)
湖州岳飞抗金遗迹考	(172)
湖州名胜考辨	(175)
湖州庙里庙——府庙考辨	(175)
骆驼桥与潮音桥考辨	(176)
湖州铁佛寺创建时间考证	(178)
道场山万寿寺曾遭“红羊劫”，	
废圯三十年于清末重建	(179)
关于韵海楼的考辨	(181)
关于释·皎然是否“韵海诸生”之辨	(182)
《石柱记》刊石于杼山考	(183)
杼山三癸亭系颜真卿为迎接袁高而筑	(185)
岷山洼樽亭始建年代考	(186)
岷山逸老堂与《岷山十五老图》	(187)
浮玉塔的始建和飞英塔的复立	(189)

智永《千字文》与吴兴永欣寺·····	(190)
有关弁山的几点考辨·····	(192)
读志札记(10 题) ·····	(194)
湖州影楼志·····	(204)
〔附辑〕	
关于编纂《湖州市名村志》的思考·····	(208)
珍惜和保护历史文化遗存是城市(镇)	
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215)

关于蚕桑丝绸起源的探源

清代以前，概以为我国的蚕织业起源于黄河流域，再传向全国各地乃至世界。正如旧府志所称：“蚕事如《禹贡》、《幽风》所陈，多在青、兖、岐、雍之境，后世渐盛于江南，而湖人尤以为先务。”^①把江南的蚕织业归结为“后世渐盛”，实为谬误之说。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魏光燾所辑《蚕桑萃编》中，则已否定上面的结论，提出“海内至广，高原宜山蚕，下隰宜泽蚕，北方养蚕晚，南方养蚕早，无不以充衣食、资赋税”。^②关于北方养蚕先于南方的误解，已不断为我国和世界各地从出土文物、民族学的研究以及有关史料所否定。

其实，《禹贡》所列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中，并未区分它们种桑养蚕和缫丝的先后。倒是宋代和元代人所作的注中已明白指出：“桑土既蚕”不独兖州，乃“九州皆赖其利”；而九州之中，“于（兖、徐、扬）三州特言之。”^③湖州在“扬州之域”，自然那时已经“桑土既蚕”了。况且，《禹贡》中指明要求贡丝绸的六个州中，兖州“织文”、青州“屨丝”、徐州“纤维”、扬州“织贝”、荆州“玄纁”、豫州“纤维”，也都是并列而言，无分先后。至于《幽风》，是春秋时期相当于今陕西省旬邑和彬县一带的诗歌，自然就“陈”不到吴、越之境。而整部《诗经》仅仅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民歌汇集。其时，吴、越、楚尽管文化不落后，但尚被认为是“蛮夷”，这是因为周王朝的政治、经济连带文化中心在中原地区的缘故。连伟大的《楚辞》，直到汉高祖刘邦和汉武帝刘彻手里才得以大行于时。所以，所谓“后世

渐盛于江南”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关于蚕织的起源，在不断的否定“黄河流域起源”说和“黄帝元妃嫫祖发明”说之中，渐见端倪。苏联学者瓦维洛夫在其《世界的农业起源问题》论文中提出“起源中心说”，认为一个种群的遗传变异性，以该种的发源地为最高，它成为向其他地区分布的中心。即某一生物种群据某一地区的时间越长，它的适应性越表现出多型化，因而该种群的遗传变异性越丰富。湖地的蚕桑变异性在全国来说，属最大的地区之一。“湖桑”自宋代人工嫁接开始形成，至清代已成为一个系列化的良种群，其覆盖面不仅遍及本省及鲁、鄂、川、苏、湘、皖、新疆等地，还远及日本。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提到的“三卧一生蚕”和“四卧再生蚕”，至1300多年后的清同治年间，就是湖地的“三眼种”和“头二蚕”。^④直到今天，湖蚕化性有三化，眠性有四眠，茧色有黄、白、松绿等，体色暗色斑深浅亦各异。其蚕丝和蚕蛹最为当地人民所利用，利用桑蚕茧剥制绵兜（丝绵）历漫长岁月，相延至今仍然还有。而北方的蚕事，自宋朝始渐见衰落，至清代已几乎绝迹。相反，“蚕事吾湖独盛”，已是“无不桑之地，无不蚕之家”。^⑤所以，清代乾隆皇帝点名要到湖州视察，说：“北方古称桑土，而今民乃不识蚕”，欲至湖州“察蚕桑之法，以利北人”。^⑥可见，蚕桑就源于“北方”（中原黄河流域）一说，难以成立。家蚕与其它畜禽、作物一样，是其分布在各地的祖先种，经当地人工驯化，复又经过不同途径的人工选择而成的多元群体。从湖州地区悠久而连绵不断的蚕桑历史，及其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蚕桑文化（包括崇拜蚕神、各种蚕俗和以蚕桑为内容的一切文学艺术），可以认为：湖地为我国蚕业起源地之一。

1958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协同浙江博物馆，在湖州城南7公里处的钱山漾东岸（今湖州常潞乡潞村百廿亩村）发掘良渚文化遗址，在下层获得不少纺织如绸片、细丝带、丝线以及麻布片、麻绳等。据测定，下层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时间约在公元前

2750±100 年,^⑦距今已有 4700 多年。所出土的绸片、丝带、丝线,为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丝织物。这为湖地先民利用茧丝资源和驯化桑蚕为家蚕有着更加久远的历史取得了物证。同时,更加有力地说明,湖地是我国最古老的蚕丝业发源地之一,也是最古老的丝织业发源地之一。

1、湖州史前文化与蚕桑丝绸的发祥

经考古研究,湖州史前文化按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这一过程的规律发展,时间跨度为距今约 6000 年至 4000 年。其中湖州城南 7 公里处的钱山漾遗址和城北 9 公里处的邱城遗址的发掘,为良渚文化的最后确定和马家浜文化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从距今约 6000 年的邱城遗址出土的诸多石铤、石斧、石凿、石刀等石制生产工具,到该遗址中层出土的如器形较小的三角形石犁,再到距今 4000 多年的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破土石器和大石犁,表明了湖地史前农业的一个发展过程,即在 5000 年前的崧泽文化时期已步入犁耕阶段,到钱山漾遗址下层即 4000 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犁耕已达到成熟阶段。因为,此前尚有耜耕和漫长的火耕阶段;而犁耕已是农业耕作一个重大改革。

据文献记载,当时包括湖地在内的吴、越地区,还是“文身断发、茹毛饮血”的东南边陲荒蛮之地。直至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还称“楚越”、“江南”的农业“或火耕水耨”,“饭稻羹鱼”,“以渔猎山伐为业”。^⑧历史记载与出土文物所表明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湖地史前农业离开“火耕”的时间,起码要比记载的提前 2700 年左右。这个时间相当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发展到龙山文化阶段,但“龙山文化也仍是以锄农业为主”。^⑨

而且,邱城遗址和钱山漾遗址的下层,都有当时人为营建的居住遗迹,还有用于水上舟楫之便的木桨遗物。在 8 种植物种子遗物中,有一般史书称为汉代以后才从国外传入的花生、芝麻、蚕豆;经

测定,稻谷遗物已有粳、籼两类的区分。再如用于农业(包括养蚕)和日常生活的篓、篮、罩、谷箩、刀筲、簸箕等竹编遗物,其编制方法丰富多彩,有的编制部位与现在的“杭州篮”相一致,尤其如“梅花眼”、“辫子口”等较复杂的花式,已达相当技艺。^⑩

以上表明,距今 6000 年至 4000 年,现在湖城的南、北居住着一个或两个较大的部族。这里的湖州先民,在临河依山的平地上从事原始农业活动。正如第一个对钱山漾遗址进行考古的湖州籍考古学家慎微之著文所说,“依地质学言之,该湖本系普通河流”、“其大部分为古城市之旧址”,“古时之钱山漾,曾一度人烟稠密,嗣因洪水泛滥,古吾陆沉,始成今日之一汪漾”,并在考古基础上得出结论说,“中国文化发源于东南,北方人吸收南方文化,发扬而光大之”。^⑪

慎微之先生的这一中国文化源流自南而北的结论,如果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中加以论证;那么,东南文化如湖地文化始终与北方中原文化同步发展,则无可置疑。我们在展开湖州丝绸发展史及其悠久的丝绸文化之前,先提出湖州的史前文化,旨在说明湖州蚕桑、丝绸的起源和发展与湖州史前文化相同步。也就是说,湖州史前蚕桑丝绸文化是整个湖州史前文化的一部分。这从钱山漾和邱城两个遗址所出土的实物中可分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作为丝绸成品,在钱山漾遗址下层获得残绢片、细丝带和丝线。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测定,其年代为 4700 余年前。又经浙江省纺织科学研究所和浙江丝绸工学院 1960 年、1979 年两次鉴定,其性状分别为——

绢片:未完全碳化,呈黄褐色,为平纹组织,表面细致、平整、光洁;丝缕平直,可清晰看到经纬丝由多根单茧丝并合成一股丝线交织而成,经纬密度分别为经密 134 根/吋、纬密 122 根/吋;经纬丝均无捻度,茧丝呈半透明状,亦无如麻纤维那样的横节。在显微镜视野上,测得经纬丝线平均直径 167 微米、单茧丝平均直径 15.6

微米,经纬股丝由 20 根左右单茧丝合并。

丝带:揉成一团,完全碳化;为辫状组织的细长带子,原料为蚕丝;有些片段残留平纹组织残片。通过投影仪解剖显微镜和显微镜摄影观测,其宽 4.44~5.35 毫米,由 4 根股丝捻合为一缕丝线,再由 3 根丝线辫结为带;为“Z”捻向,带的直径为 433 微米,股丝中的单丝平均直径 14.7 微米。

丝线:已全部碳化的一团乱丝,原料为蚕丝,“S”捻向。

这些就是 4700 多年以前湖州先民所生产的蚕丝和丝织品。经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和浙江丝绸工学院作截面切片鉴定,其截面图像显示一般蚕丝截面呈钝三角形的特征;茧丝平均截面为 259 平方微米,这与现代蚕丝截面为 150~250 平方微米相近。

其次,钱山漾遗址出土的农业(包括养蚕用具如竹编的篓、篮、箩、筛、簸箕、席等遗物,以及该遗址和更早的邱城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如石、陶质纺轮,石、骨质针等遗物,^⑫可以说明——

养蚕:采集桑蚕(野蚕)茧,同时又驯养家蚕。这从出土丝织物单根茧丝的截面与现代茧丝相近亦可得到佐证。

丝织:以轮纺线,以针引织,这是最原始的编织。而出土绢片采用平纹织法,其经、纬密度都在 120 根/吋以上,已同现代丝织品相近;且经密高于纬密 12 根/吋,这与现代一般丝织品亦相似(如现代花绫经密每厘米 50 根、纬密每厘米 30 根)。这些精细的丝织品以及同时出土的苧麻织品,标志着当时湖州先民在种植桑麻和纺织丝、麻织品技术上已获得巨大的成就,“可能已经有了最简单的织机”。^⑬

总之,代表湖州丝绸文化最早起点的钱山漾史前丝绸文物,是迄今国内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丝织品。而同时代的中原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仅能凭陶器底部保留的布的印痕来推测当时原始人着衣上为平纹组织的粗布,而且“这种布可能是以野生的麻类纤维纺织而成”。^⑭可见,钱山漾丝绸文物也是迄今中国丝绸文化最早

的起点(包括苧麻织物也为迄今中国之最);湖州城南钱山漾和城北邱城这些地方,是我国蚕、丝、绸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2、湖地土著文化与蚕桑丝绸起源

我们再从湖地古代土著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来看湖州蚕桑丝绸的起源。这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所谓“文化”,作为词语,源于拉丁文,即“耕作”之意。用在考古学上,是指同一历史时期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即同样的工具、用具和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就如湖州钱山漾文化遗址属于良渚文化,邱城遗址下层属于崧泽文化,都与原始人类的劳动分不开。钱山漾出土 4700 多年以前的绢片等丝织、麻织品的同时,还有许多诸如斧、钺、刀、镞、钻、凿、矛、戈、犁等石器,仅 1956 年和 1958 年两次发掘,达 549 件之多;标志纺织技术水平的陶制纺轮多达 57 件。^⑬这些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石、陶制工具和用具,是湖州本地先民用来耕作、狩猎、纺织的,是维持生计的器具,同时也有用作抵御外敌的武器,为迄今发现最早的湖地土著文化。它相当于北方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但“比龙山文化进步”。^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龙山文化一些遗址,没有这样多而丰富的文化堆积;二是器物的先进,如陶纺轮及矛、钺、戈等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堆积层中尚未发现。而且,更早的邱城遗址已发现有陶质纺轮,与之相当的中原黄河流域仰韶文化还只发现石质纺轮,这更可见湖州土著文化的久远和先进。作为其中一分子的土著蚕桑丝绸文化,也因此历史久远、水平先进。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深刻地影响了包括蚕桑丝绸文化在内的湖州史前土著文化。在土著文化的延续中,从黄帝开始的“五帝”及夏禹时代,似乎出现了“断档”。自 1973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埋藏了 2142 年的《黄帝四经》以后,黄帝已不再是传说中人物,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于是许多所谓的“神话”,也就

跃居为史实。一些古籍透露出这样的信息：黄帝是在诛杀了蚩尤、降服了神农（炎帝）后才在中原建立统一的国家。而蚩尤当时在南方，“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这是宋代罗泌《路史·后纪四·蚩尤传》的记载。《路史》专辑撰我国传说时代的史实（因为黄帝的缘故，“传说时代”的含义也更趋真实）。作为南方“天帝”的炎帝，比中央“天帝”的黄帝在“行仁道”方面“恐怕还要行得多些”，故被尊为“神农”。^①但强悍的黄帝要征伐他。因为，“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②故“教熊、黑、貔、豸、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③于是，“蚩尤作兵伐黄帝”。^④即炎帝兵败，蚩尤崛起为之复仇。蚩尤不打无准备之仗，他利用南方先进于北方的制造技术，制造了五种兵器。这就是战国时期史官所辑的《世本》中所记载的，“蚩尤作五兵：戈、矛、戟、猷矛、夷矛。”“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擒）杀蚩尤”，而黄帝杀蚩尤的理由也是“蚩尤作乱，不用帝命”。^⑤当一个民族遭受兵伐厄运时，他们的后代会前赴后继抗争到底的。继炎帝、蚩尤之后，他们的部下刑天、夸父、共工之属，都因为抗争而泯灭，然而猛志常在。居于南方的一个庞大的部族的独立性因此而被取消了，等于说是“亡国”了。

这就是上文所提及的“历史的原因”。用慎微之先生的论述，则是“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当时蚩尤在南方，已能铸铜为兵器，作刀戟大弩，为炎属之后，爱好和平；黄帝居北方，好战伐，以弦木为弧剡木为矢，而霸中国。故当时北方之文化尚不及南方，自黄帝战败蚩尤后，遂尽力吸取南方文化之精华，发扬而光大之，但究不能因此而谓南方之后于北方也。”^⑥关于这一点，清代马骕《绎史》卷五所引《黄帝内传》泄露：“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维之功。”这就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即黄、炎之战是为了进贡蚕丝。这就又跟蚕丝的起源有关了。《路史·后纪五》：“（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嫫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学术界也就一直沿用“嫫祖养

蚕”，因为黄帝发迹于黄河流域，所以也认为蚕桑起源于黄河流域。殊不知，记录这一传说的是宋人，更早的《史记·五帝本纪》只是说黄帝“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并没有养蚕一类文字。至于“蚕神”，三国时吴人张俨笔下就有记载，即“蚕马神”。湖地蚕俗自古盛于祀奉蚕神，俗呼“蚕姑”，又称“马头娘”、“马鸣王菩萨”，“佛寺中亦有塑像妇饰而乘马”，“乡下多祀之，下蚕后室中即奉马头娘，遇眠以粉茧香花供奉，蚕毕送之”。^②至于“嫫祖先蚕”，仅仅在府治的照磨所故署立个神位，直至清嘉庆四年（1799）抚浙中丞请奏后，才在东岳宫左侧建庙，而且只限“有司祭祀”，乡民“不敢褻祀先蚕”^③。“有司”谓地方官，也就是所谓的“正统”；而对于蚕神蚕姑，则“乡下多祀之”，这才是历史沉淀下来的相沿成习的湖地蚕桑风俗，是蚕农代代自觉遵守的群体规范。这种世代相传的现象，即属于土著文化。

同样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远古湖地先民早于中原就有的石制（接着是铜制）武器。且不说钱山漾和邱城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器，1986年，湖州东林乡（位于钱山漾南）良渚文化时期的墓葬所出土的玉制斧、钺，已经是一种礼器了，其性质更体现为属于军事统帅的那种权力象征物。而《世本·作篇》说，蚩尤“以金作兵器”，是冶炼金属的最早发明者。^④其实，金者，铜也。即慎微之先生所说的“铸铜为兵器”。蚩尤作兵器，是为了反抗黄帝的征伐；黄帝的征伐，则为了“蚕神献丝”。自从黄帝战败了蚩尤，“蚕神献丝”以后，“乃称织维之功”。从此，东南的丝绸就向北方的朝廷进贡了。武器与蚕丝几乎密不可分。在湖地的土著文化中，蚕桑风俗最为丰富。以典型的“祛蚕祟”为例，蚕农每于清明始作蚕事准备，这一天要在蚕房门口用石灰在地上撒出戈、矛、戟、弓弩等兵器形状，说是祛祟避邪，但从中亦能窥见远古为蚕丝而大战的风烟。再回过头来看中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那里的文化遗址中竟然还未发现有戈、

矛、钺之类可用作兵器的石器,这不能说不是个遗憾。

3、远古湖地蚕桑丝绸文化源流的动向

涉及蚕桑丝绸的起源问题,我们还可以从《夏书》的开篇《禹贡》中寻求答案。《禹贡》把中国分为九州,虽是后人(多数学者认为约是战国时人)假托为夏禹治水后形成的政区,但把治水传说发展为古代地理著作而弥足珍贵。现在湖州市这块地方,当时属“扬州”。^②《禹贡》中“扬州”条说,大禹治水使“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三江即娄江、东江、松江,在太湖东南岸域;震泽即太湖。^③这两句所指地理位置即太湖东南流域的吴地,包括今苏州、吴江、湖州及长兴部分地区。

禹受舜命治水利。禹与其父鲧都是治水的英雄,鲧之父颛顼,禹之七世孙夏后杼,^④在传说和史载中,他们都与湖地有些瓜葛。禹治太湖,足迹自然遍及。舜曾在湖地的余鱼浦外雷泽捕鱼,又传说他在尧市山下舜田耕作。^⑤湖州之南杼山,传“昔夏后杼巡狩之所”。^⑥宋代叶梦得根据唐代颜真卿《吴兴地记》及前代《吴兴图经》,称湖州境内有颛顼墓,在衡山;同时针对“颛顼都帝邱,今濮州,是无缘冢在此”的说法驳斥道:对于流传虽不可全信,但正如舜葬苍梧、禹葬会稽那样,何必一定在都城呢!又像杼山,夏杼至此亦不奇怪。^⑦还有鲧,“是从天上把‘息壤’偷下来替人民治平洪水的大神^⑧”。所谓“息壤”,实际上就是肥沃而干湿相宜的宜桑之土。正如清代《西吴蚕略》所言:“蚕桑随地可兴,而湖州独甲天下,不独尽艺养之宜,盖亦治地得其道焉。厥土涂泥,陂塘四达,水潦易消,《周礼》谓川泽之土,植物宜膏,原隰之土,植物宜丛,湖实兼之,乃《淮南》所谓息土也。”

所以,尽管湖地的史前土著文化在这段时期表面上“断档”,但上述情形不能说不是一种弥补。而我们从《禹贡》的字里行间,更能找到湖地古老的蚕桑丝绸文化的源流动向。而这一动向,是和湖州

钱山漾及邱城文化遗址所表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蚕丝文化相承接的。可从以下几点证明：

其一，所谓的“桑土既蚕”非中原九州所擅有，九州皆有其类。虽然《禹贡》在九州之中唯“兖州”条下写了“桑土既蚕”，但蔡沈的注为我们澄清了一个事实，他在“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句下注：“桑土，宜桑之土；既蚕者，可以蚕桑也。蚕性恶湿，故水退而后可蚕”。《禹贡》所列九州地理、物产、贡赋等，是在大禹治平九州水患之后，所以蔡沈接下去才说“然九州皆赖其利”。下面一句“是降丘宅土”，意思是原先兖地之民“依丘陵以居”，这时（指水退后）“始得下居平地”。这个情形，九州是一样的。比夏代更早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湖地先民已经作宅定居于依山临水的平地农耕、蚕桑、渔牧了。所以，下面蔡沈又将兖、徐、扬并列为“东南三州”，这说明同样是“桑土既蚕”的。

其二，“桑土既蚕”尤称兖、徐、扬三州，“扬州”尤称太湖东、南流域。蔡沈在“兖州”厥草惟繇，厥木惟条”下注：“兖、徐、扬三州最居东南下流，其地卑湿沮洳，洪水为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条或夭或乔，而或渐包。故于三州特言之，以见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东南下流”指今鲁南、江浙、赣东北一带。而《禹贡》“扬州”中，只点了“三江”、“震泽”的太湖流域和“彭蠡”（鄱阳湖）一带。“震泽底定，篠簜既敷”，太湖南岸的湖地自古盛产竹子。蔡沈注：“篠之材，中于矢之箭。”这种用作箭杆的“箭竹”，湖地长兴、武康、湖州一带更多。^③《尔雅·释地》称为“东南之美”。钱山漾出土的竹编织物，就用这种小竹子。^④篠簜遍布，同时“厥草惟夭，厥木惟乔”。桑，木之属。自然也“得遂其性”，不仅“条”（长）、乔（高），而且“渐包（丛生）”。

其三，《禹贡》九州中六州贡丝绸。从所贡之物看，数兖、扬二州最华贵。兖州贡“织文”，注说“织而有文，锦绮之属”；扬州贡“织贝”，注说“锦名，织为贝文，诗曰贝锦”。徐州的“玄纁”和荆州的